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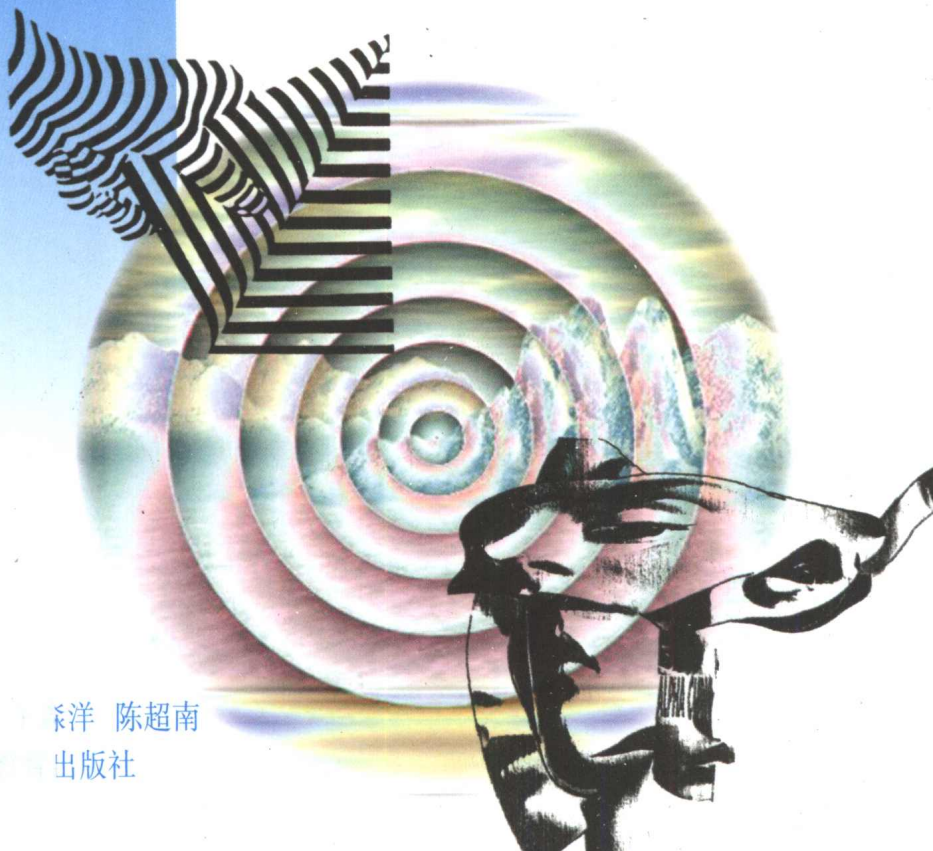
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

KSJLLXSYCS

彩色的天平

——传媒伦理新探

●陈超南 著



6-05 陈超南 著
出版社

理 新 视 野 丛 书

彩色的天平

——传媒伦理新探

●陈超南 著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陈超南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

ISBN 7-5351-2764-9

I. 彩… II. 陈… III. 传播学—伦理学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536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150 千字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4 插页 6.75 印张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51-2764-9/B·27

定价:13.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近代以来,个人的权利与价值受到了重视,但人们不得不关心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中,言行的公共准则与伦理规范是必不可少的。过分强调个人的自尊与自利,尤其是在其极端发展之时,常常会引起矛盾与冲突。社会伦理则能调节与规范人们的行为,使社会的活动与人们的言行具有秩序性与稳定性。这不仅是社会运行的必要准则,而且也是个体安全的必备条件。它既保障了个体正当权利与价值的实现,又防止了个体免遭他人非正当要求的伤害。

然而,伦理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已经实现现代化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在提高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在改善社会的管理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这种情形下,伦理规范与道德问题引起世人的普遍注意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不作变革的传统伦理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永远常青的生活面前,它仍然是灰色的。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把人们的伦理思考推进了一大步。既然经济已经全球化,那么,有无伦理世界化的必要和可能?经济与伦理,既分属于两个很不相同的领域,却又常常相互遭遇。经济与物质追求和利润目标相涉,颇具利己的特征。伦理讲究

助人为乐、克己奉公、坚忍不拔、品格高尚，常常表现在利他的活动中。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现代社会诸多领域（包括伦理）都受其直接或间接的推动。然而，伦理则有助于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秩序性，故而利己的经济与利他的伦理便成了相关的话题而不断引起智者学人的重视和探讨。18世纪的亚当·斯密最具代表性，他从同情心的角度撰写了利他主义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但又在《国富论》（1776）中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他对伦理与经济这对永恒的难题进行了毕生的探讨。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是阿马蒂亚·森，他以“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而获此殊荣。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伦理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些学者在1995年发起了“走向全球伦理”的运动，希冀能确定全球认同的伦理原则“作为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础”。这种对“全球性的公民伦理”的期望因现代立体交通的快捷、信息网络的联通、大众传媒的流行而日益显出其合理性。它对现代伦理的跨文化研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标之一。

当今社会的许多重大活动乃至常规活动都是经由社会机构或团体而进行的。因此，现代伦理学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注重各种社会机构或团体及其相互之间道德规范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关于工作伦理的论述提出了“社会品德”的概念，它被人们解释为社会机构之间的信任程度、交往能力和团体之中的凝聚力。这是传统伦理不曾涉及到的全新课题。传统伦理论述的重点在于个人。“独善其身”与“杀身成仁”是至高的道德境界。无条件地遵守伦理原则犹如执行“绝对命令”，体现了道德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虽然这些伦理

原则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仅仅用严于律己的要求人们却难以规范机构或团体之间在交往活动中的各种关系。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组织化、体系化、结构化的程度,需要有一系列法律上、伦理上甚至是制度上的措施才能维护社会的有序性。

不仅如此,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时时处处也在与机构、团体、制度打交道。从他的教育、工作、医疗、养老到他的居住环境、休闲娱乐、生育子女,全都被纳入社会的各种体系之中。例如,他坐在电视机前选择什么节目看悉听尊便,但在节目的背后则是作为文化产业机构的传媒公司的运作。

现代伦理因其社会活动组织化、体系化的特征而在应用层面上出现了具体化、门类化的趋势,又因跨文化研究而出现世界共同关心的若干伦理学热点,它们组成了现代伦理的新景观。

将现代市场经济理解为是对利润的追逐、竞争、搏杀,犹如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始“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运动及其学派的诞生表明,按这种“丛林”概念进行的经济活动已经失去其存在于社会中的理由。走出“丛林”已经成为全社会包括企业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

科学技术的进步曾被喻为替人类盗来天火并传授技艺的普罗米修斯。然而,现代科技一旦偏离了为人类造福的方向,带给人类的却是祸害和灾难。科技发展同样离不开伦理的协调。

现代社会诸多难题对宗教中陈旧的伦理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生与死、善与恶、此世与来世这类宗教伦理的永恒主题必须吸收现代观念和价值的某些因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大众传媒的兴起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延伸了人类的耳朵、眼睛和精神空间,随着人类交往的日趋频繁,地球因此而缩小为一个“村落”。在种种动机的驱动下,各种传媒渠道中充满

着形形色色的信息。排除假、丑、恶的信息污染成了传媒伦理学的一大课题。

当地球母亲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巧取豪夺”面前发出呻吟，并作出无情的报复的时候，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难道人们为了自己一时的利益可以榨取地球上的一切？难道将养育我们的自然环境沦为奴仆是道德的吗？现代伦理无法回避环境伦理的问题。

现代医学因科技而突飞猛进，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向传统伦理发起了挑战。人类究竟有无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救死扶伤是否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安乐死有无价值？生命伦理学因讨论这些问题而为人们所瞩目。

4 妇女的地位是人类解放的尺度之一。现代文明为妇女提供了教育、就业、政治上与男人相等或相仿的权利。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不仅对传统伦理中重男轻女的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对社会在教育、宗教、伦理、家庭和日常生活中对性的压抑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性改革”对人们伦理规范的影响不可低估。妇女伦理学、性伦理学的提出有利于廓清一些失范的混乱和迷茫的误区。

《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是顺应现代伦理发展的新趋势所作的一次探索，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有识之士给予指正。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和陆才坚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努力，这套丛书走向社会的步伐将会放慢。

陈超南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98年10月20日

目

录

序 /1

1 传媒伦理学的先声和现状 /1

- 1. 1 潜伏隐藏的伦理问题 /2
- 1. 2 传媒伦理的先声 /8
- 1. 3 形式多样的督察 /14
- 1. 4 传媒伦理学的兴起 /19

1 ←

2 传播的伦理原则 /26

- 2. 1 新闻出版自由 /27
- 2. 2 社会责任论 /36
- 2. 3 正义与公正 /44
- 2. 4 讲真话 /52
- 2. 5 严守职业秘密和尊重隐私 /60

3 传媒伦理与社会环境 /69

- 3. 1 文化传统 /70
- 3. 2 政治导向 /78
- 3. 3 经济控制 /86

3. 4 法律制约 /94

4 传媒伦理与信息传播 /103

4. 1 传媒伦理与信息交流 /104

4. 2 传媒伦理与信息需求 /112

4. 3 传媒伦理与信息效果 /121

4. 4 传媒伦理与科技发展 /130

5 传媒伦理与传媒文化 /140

5. 1 传媒政治文化的表与里 /141

5. 2 传媒大众文化的娱乐化 /150

5. 3 传媒大众文化的商业化 /158

5. 4 传媒主流文化的隐与显 /167

6 开放与挑战 /176

6. 1 本土化与全球化 /177

6. 2 传媒帝国主义 /186

6. 3 新的可能性 /195

后记 /205

新兴学科犹如一片刚开垦的处女地，散发着新泥土的芳香，然而，庄稼尚未种满，还有不少可插足之处。既然已有人在上面开垦耕耘，那么，让我们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的景象如何？

在笔者面前有两本关于传媒伦理学的著作。其一是我国新闻学老前辈周鸿书的《新闻伦理学论纲》，其二是美国当代传媒学者康拉德·C·芬克的《传媒伦理学》。翻阅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不仅两者的观点有所差异，而且两者在写法上也有若干不同之处。例如，前者偏于严谨，多少像教科书那样，试图用较明确的语句和判断，还特辟一节的篇幅讨论新闻伦理学的学科界定；

后者则较为自由,全书容量比前者略大,却避开对传媒伦理学的学科界定。又如,前者考虑理论上的完整性,以理性表述为主;后者则具有事例的丰富性,以现象描述为主,理性分析仅点到为止,不求确定无疑的结论。

对于传媒伦理学这新兴学科来说,探明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围,以及具体研讨有关的问题和现象,都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正如周鸿书在该书“新闻伦理学的界定”一节中所举的几个定义来看,一个比一个完整,但是他本人并不想将他提出的界定封闭起来。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新兴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围,它的学科界定,同样处于开放状态之中。这使得新学科的界定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因此,我们不忙于寻求关于传媒伦理学的精确界定,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该学科的历史形成和当今现状中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与事件上。就像先在水中游泳,后作游泳规律总结那样,我们先进入传媒伦理学的具体讨论之中,或许这更有利于我们今后对它作学科的界定。

1.1 潜伏隐藏的伦理问题

信息传递,古已有之。从手势、发声到语言、文字;从击鼓、烽火到驿站、报状;从采风、记史到邸报、朝报,人们可以列举出古代许多信息传递的方式,甚至可以说,现代“报纸”一词源出于唐代《经律集》一书中的记载,把手写新闻的纸称为报纸。其实,古代所称的报纸与现代报纸,其间差别极大。人们可以称前者是后者的雏形,但不一定硬要证明古代的报纸便是古代的大众传媒。

■ 古代传媒

如果从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特征复制性来看,我国明清时期的刻板印刷年画和活版印刷的“京报”已具有一定规模的复制数量。如河南朱仙镇南在清代兴隆之时有300多家年画作坊,从起稿、刻板到印刷,自成一体,产品散布全国。而河北武强南关的年画店铺毗连成街,画店40余家,每店年销80万张。^①“京报”是我国古代报纸的最高形式,有固定的报名和报房,开始呈现出某些大众传播工具的性质: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信息是公共的,有大致确定的接受对象;活版印刷,有一定的数量。^②

既然刻版年画与活版“京报”有较固定的制作人、发行渠道、接受对象,那么,制作人的道德素质,传递内容的道德观念,乃至反映在其中的事实的真伪,也都与伦理有关。不说官方“京报”灌输封建的三纲五常,就是民办小报与刻板年画也都宣扬封建的道德规范。如明末刻印的宣扬廿四孝的《孝行图》,以及现藏于安徽博物馆的《李密尽孝》、《孔明竭忠》等。但是,也有为民说话揭露社会黑暗的小报。据《民抄董宦事实》所载,时官时隐的董其昌在华亭一带为非作歹,不仅霸占“膏腴万顷”,草菅人命,而且妻妾成群,强抢民女,其子董祖常更是仗势横行,恶霸一方。当时,“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揭露董家“浮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一时间“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民谣传遍大街小巷。还出现刊刻大字揭纸:“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③

① 参见薄松年《中国年画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② 参见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③ 参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在后来发生的火烧董家楼的事件中,小报所起的舆论宣传作用不可小视。

然而,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小报对董其昌罪行的讨伐以及道德评价,并不会引发当时的学人去对报纸作伦理的思考。我们要考察传媒中的伦理问题,应从近代出现了正式意义上的传播媒体开始。

《辞海》(1979年版)云:报纸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刊载新闻为主的面向公众、定期、连续发行的出版物,是把个人同国家、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和社会舆论工具”。这个意义上的报纸,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欧洲,周刊是《传道或新闻报》(德国),日报为《莱比锡新闻》(德国,1660年)。

第一家中文日报是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在时间上落后于欧洲200余年。它的知名度和影响远不如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申报》所引发的社会道德问题也远远超过《中外新报》。如在《申报》上登载的众多“竹枝词”以及随《申报》附送的《点石斋画报》(始于1884年),它们对于近代上海市民在道德观念上的演变和复杂情况,既有反映又有影响,常为研究近代上海社会的论著所提及。

■ 近现代传媒

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的广泛运用和飞速发展,较充分地呈现出现代传播媒介的特征。上面所引的《辞海》对报纸所具有的面向公众、定期、连续发行等特点的说法,似乎已嫌不足。在1999年版的《辞海》中,对报纸的界定增加了“是以传播新闻为主、反映和引导舆论的重要工具”这个内容。对报纸的现代特征未能展开。传播学的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认为:“当我们讲到

大众媒介,通常指的是中间插进了用以重复或传布信息符号的机器和有编辑人员的诸如报纸或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的传播渠道。”^① 施拉姆将用机器复制与传布信息符号和建立专门的传播组织这两点作为现代传媒的主要特征,作为区别古代传媒的重要标志,这是很有意义的。

施拉姆将那种“毋需机器与传播机构居间的传通方式”称为“个人与个人间的传通”。这种传通是古代人传通信息的主要形式。击鼓、面谈等方式自不待言,就是那些传统刻版年画的作坊和制作活版“京报”的民营组织,也难以称为传播媒介。因为,第一,它们不具备近代意义的信息符号复制与分配的机械装置和一定组织形式的传播组织。第二,它们不具备定期、连续发行的传通方式,所面向公众的范围也极为有限。

施拉姆在谈到个人与个人之间毋需机器与传播机构居间的传通方式时,问道:“用电话来对讲应该归于哪一类呢?”他承认,区分起来有些困难。其实,将他提出的信息符号复制与分配的机器与专门的传播组织,加上面向公众、定期、连续发行等特点综合起来,我们便能较好地谈论电话了。一般的电话往来不能称为传媒,因为它不具备上述的主要特征。至于那些声讯电话,因为有专门的传播机构在操作,连续不停地向来电询问的人传播一定的讯息,它们应划入传播媒介之列。

一些青少年从报纸上或从同学那里得到某种热线电话的号码,出于好奇,拨通电话,从中得到某些信息,有时甚至是色情的谈话内容,不仅让父母破费去付高额的话费,而且还因此学业荒疏以至堕落。类似的事例在报纸上已有多次报道。这类热线

^①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2 页。

电话在“心理咨询”、“谈心”的伪装下向青少年传播庸俗色情的内容,这正是传媒伦理学要讨论的问题。

电话是否归属传媒的讨论,有利于我们对什么是传媒的理解。按照上述的界说,我们讨论的是近现代的传媒,一般不涉及古代的传播方式,例如古罗马的《每日纪事报》和唐代开元年间(713-741)的邸报《开元杂报》,这是时间上的界限。按上述的界说,我们讨论的是具有大众传播形式的传媒,不将现代人所使用的所有传播方式全部纳入讨论的范围,例如现代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信息在个人之间直接传递,但比起社会的信息传播网络来说,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只是一种简单的初始的形式。这是传播方式上的界限。由此而展开的传媒伦理的探索,自然也遵循这两个基本界限。

在现代广泛使用的各种传播媒介中,最早登上历史舞台,最先发挥巨大社会影响的传媒形式是报纸。它在资产阶级战胜封建王朝的革命中发挥了强大的舆论作用,并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的具体成果。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其中明确了自由的权利及其应负的社会责任:“每个公民都应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自由承担责任。”两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则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该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本身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

■ 传播言论之善恶

现代社会常以自由作为文明的标志,言论与传播的自由便成了其中应有之义。不过,现代文明的成果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现代瑞士著名学者C.荣格对现代社会的弊端进行尖锐批

评时指出：“每种好的品质都有其坏的一面，因此凡是世界上的善一定也有其相对的恶。”^①

新闻自由将言论出版的权力从封建贵族专制中解放出来，本是为了言谈之善。例如，民众通过报纸上登载的时事新闻、社会报道、知识小品、产品广告等内容，较为及时和广泛地知晓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作出一定的讨论与反应。然而新闻自由同样也为言论之恶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一些报纸在市场竞争中，为了争夺读者、压倒别的报纸、谋求利润的增长，便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力。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早期例子是本杰明·戴创办的《纽约太阳报》。1835年8月21日，该报报道了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谢尔爵士在非洲好望角用特大望远镜观望月球。人们急于想了解观测结果。该报利用人们的好奇心，一连炮制了七篇报道，捏造了月球上发现了湖泊、鸟兽甚至有翼能飞的“蝙蝠人”。一时间《纽约太阳报》名声大噪，印量剧增，读者日众。其实，这些报道全都是《纽约太阳报》老板一手策划的，为的是从轰动效应中获取利润。

不仅如此，该报不像当时正统的报纸那样以登载较为严肃的政论新闻为主，而是面向一般读者。本杰明·戴雇佣了乔治·威斯勒专门采访警察局、法院，报道各种犯罪活动，以迎合民众的口味。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该报在创刊号上宣称：“本报的目的是办一份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报纸，为公众报道当天的新闻，同时提供有利的广告媒介。”确实，该报每份报纸售价从6美分降至1美分，被人们称为“便士报纸”。发行量激增又为该报赢

^① [瑞士]C. 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298页。

得了大量的广告。据统计,当时的“政论报纸”的发行量仅及该报的一半。《纽约太阳报》全然不顾及社会的道德责任,大量登载民众喜欢的煽情新闻和商业广告,甚至虚假新闻。该报适应了城市工人与其他中下层市民的需求,开了“大众报纸”的先河,但一味追逐利润而不择手段也引发了不负道德责任的媚俗倾向。19世纪末出现的“黄色新闻时期”便是这种倾向泛滥的结果。

1.2 传媒伦理的先声

人们从报业发展中获得了消息畅通的莫大好处,但又不得不为报纸上的虚假报道、色情内容和滥登广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而困扰。最早提出新闻伦理问题的是较有社会责任感的报人。

■ 报人的良心发现

1841年,霍勒斯·格里利创办《纽约论坛报》时,在创办启事中声称:“它将努力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他们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利益。它将摒弃许多著名便士报上的不道德的、下流的警察局新闻、广告和一些其他材料。我们将尽心把报纸办成赢得善良的、有教养的人们嘉许的、受欢迎的家庭常客。”^①《纽约论坛报》在当时与本杰明·戴创办的《纽约太阳报》和詹姆斯·贝内特创办的《先驱报》合称美国大众报纸的三大代表。但在格里利主持下的《纽约论坛报》不以庸俗取胜,比较严肃。从1851年到1862年,马克思还应邀担任该报驻欧通讯员,写过一些

^① 张隆栋:《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